

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篇考辨

廖名春

提要：上博楚竹書所謂的《子道餓》篇當稱之為《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此篇記載的主要是子游之事，與孔子無涉。簡文所謂“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子游辭行“至宋、衛之間”遇險，當是子游為孔子“廬墓三年”以後之事。這是傳世文獻從來沒有過的新記載。以此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互參，可知子游在孔門中的地位，遠勝於子夏、子張之輩。上承孔子，下啓思、孟的，不是顏、曾，而是子游。

關鍵詞：上博楚竹書(八) 子游 魯司寇 子思學派

新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 有一篇《子道餓》的文獻，稱有簡六枚，其中完簡兩枚，殘簡四枚。^① 筆者讀到整理者濮茅左的說明、釋文、注釋，感覺其雖然有開創之功，但問題也不少。遂與李銳討論，在李銳意見的基礎上草成一文。後來又讀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圖版，頁15—20；釋文考釋，頁117—136。

到鄧少平的文章,有了改寫之念。現在又看到了葛亮執筆的大作及其評論,^①解決了不少問題,深受啓發。於是就動手修改,將自己的原作從內容到篇題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下面,就是參考李銳、鄧少平、葛亮、劉洪濤諸君意見,對濮茅左釋文及其所引發的一些問題所作的討論。拋磚引玉,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 釋文考訂

濮茅左稱全篇有簡六枚,鄧少平六月初即指出“第6簡‘而’、‘之’兩字的寫法與本篇其他簡皆不同,簡文意義也看不出和其他簡有何關聯,恐原不屬本篇。”鄧說是。

李銳和鄧少平都認為“第4、5兩簡有可能遙綴為一簡,其中只有幾個字長度的缺簡”,而簡3、2、1當為一編連組。他們的意見是簡4加簡5為開篇,再接以簡3、2、1組。我的意見則相反,以為當以簡3、2、1組居前,以簡4加簡5殿後。現在看到了葛亮的文章,感到我的意見應當修正,簡序當以李銳、鄧少平、葛亮所排為準。

下面,先列出我們改進了釋文,再加以簡要的考訂。

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曰“除乎!司寇₄將見我。”門人既除,而司寇不至。言游去,司(寇)₅……“將焉往?”言游曰:“食而弗與為禮,是獸工畜₃之也。偃也修其德行,以受獸工之食於子,於偃違,於子損,於是乎何待?”遂行。至宋、衛之

① 李銳《讀〈上博八〉札記》(未刊稿),下引李說同;廖名春《上博楚簡〈子游〉篇考辨》(未刊稿);鄧少平《〈上博八·子道餓〉重編新釋(初稿)》(未刊稿),下引鄧說同;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子道餓〉校讀》(葛亮執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7月17日。下引簡稱為“葛文”。

間其一₂子道餓而死焉。門人諫曰“吾子齒年長矣，家生甚急，生未有所定，願吾子之圖之也。”言游，……

“寄”原作“奇”。劉洪濤以為當讀為“寄”，並舉《左傳·襄公十四年》“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為證^①，而“以邾寄衛侯”即“寄衛侯於邾”。^②說是。“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即“魯司寇以遠楚寄言游”，也就是魯司寇委托言游管理其封邑遠楚。

“除”濮作“荼”，葛文讀為“除”，訓為糞除。

“將”為葛文所綴合，濮作“左”，鄧少平疑為“欲”。

“見”濮作“相”，鄧少平釋為“見”，葛文同。

“將焉往”前簡有殘損。從下文內容看，當是魯司寇得知子游要走，前來見子游，因而問子游是如何想的，為何要走，為何要離去。

“獸工”濮作“戰攻”，^③李銳讀為“守攻”。案“獸工”即製革工。《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玄注“獸工，函鮑鞞韋裘也。”^④此泛指工匠。先秦時工匠地位低下，故簡文稱“畜”。“禮不下庶人”，故“食而弗與為禮”。

“於偃違”，“違”濮作“僞”，李銳疑讀“違”，說是。“違”義為恨、怨恨。《史記·屈原列傳》：“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⑤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五》：“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

①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二，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957下。

② 見《上博八〈子道餓〉校讀》文後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7月18日。

③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頁126。

④ 《禮記正義》卷四，十三經注疏本，頁1261中。

⑤ 《史記》卷八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489。

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①《文選·班固〈幽通賦〉》：“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李善注引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悵。悵亦恨也。”^②子游此是說自己本為修德的君子，但魯司寇卻拿他當普通工匠看，不予禮遇，所以“於偃違”，自己引以為恨。

“於子損”，“損”原作“員”，濮讀為“云”，^③從李銳讀為“損”。子游“食”於“魯司寇”，“畜之”於“魯司寇”，要耗費“魯司寇”之資財，故云“於子損”。

“於是乎何待”，“何待”，濮作“可旅”，^④今從李銳說。“何待”待何。“於是乎”猶“於是”。《國語·周語上》：“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⑤《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虛觀存亡。”^⑥“於是乎何待”，在此等待什麼，因此有什麼值得等待的。

“其一子道餓而死焉”，濮茅左以為“子”為“孔子”，“子道餓”，指魯哀公六年（前四八九）孔子六十三歲那年，與弟子在陳蔡之間被困絕糧事。^⑦說誤。此“子”並非孔子，筆者曾以為是子游門人中的一個，葛文則認為是子游之子。從下文看，葛說是。不過此“子”當泛指子女。當是子游子女中的一個。

“家生甚急”，“家”，濮茅左以為“指家族、家人”。“生”，原作“甞”，濮讀為“性”。^⑧案“甞”當讀為“生”。“家生”，一家的生

① 王念孫《讀書雜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頁135上。

② 《文選》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7年，頁208下。

③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頁125。

④ 同上書，頁125。

⑤ 《國語》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0。

⑥ 《漢書》卷二七中之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355。

⑦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頁121。

⑧ 同上書，頁122。

計。《史記·倉公列傳》：“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①“家生甚急”此指子游辭行之後，在“宋、衛之間”生計緊張，遭遇飢餓。

“生未有所定”，“生”濮讀為“性”；“定”原作“奠”，^②從李銳說。案：此“生”當指生存、活，與“死”相對。《詩·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③《漢書·韓信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④“生未有所定”，生存尚不能確定，指還在死亡的威脅之中。

“願吾子之圖之也”，前一“之”字濮作“止”，訓為“勸止，阻止”。^⑤從李銳說。結合上文，可知這是子游的門人勸諫子游考慮目前的困境，不要離開魯司寇，重新回到魯司寇門下。

二 史事辨析

此篇竹書的內容濮茅左認為是“孔子餓於陳蔡，大家共策脫險。”“言游堅持原行計劃，阻止了門人之諫”。“於是北上告急於魯”，“魯司寇反常（見難不救）”，言游“又南退至楚國”，（並告之）左相”，（由於子貢南下成功，楚師相濟）孔子與弟子、門人逃過了一次大險難”。^⑥這些分析，可商榷之處甚夥。

首先，此篇竹書的記載與孔子無涉。^⑦所謂“子道餓”，濮茅左

① 《史記》卷一〇五，頁2814。

②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頁122。

③ 《毛詩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本，頁300上。

④ 《漢書》卷三四，頁1870。

⑤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頁123。

⑥ 同上書，頁120。

⑦ 李銳有相同的意見，見《讀〈上博八〉札記》。

以為指“孔子餓於陳蔡”，是不能成立的。濮氏以“子”與“門人”、“言游”在簡文中“同時出現”，遂引《論語》為證，以為“子”即“孔子”，未免穿鑿附會。違論“子道餓”當與簡二“其一”相連，就下文“而死焉”來看，也扞格不通。“子道餓而死焉”，只能理解為“子”因“道餓而死於此”，絕不能說成“子”因“道餓而”將“死焉”。如果說“子道餓而死焉”是孔子“道餓而死焉”，頗有荒誕不經之嫌。因為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都只有孔子厄於陳蔡的記載，並沒有孔子餓死於陳蔡的說法。

其次，應該肯定，此竹書記載的主要是子游之事。簡文開頭就告訴我們“魯司寇寄言游於遂楚”，是說魯司寇托言游為他管理“遂楚”。言游為孔門高弟，在魯國是有名的賢人，所以魯司寇要去拜見言游。言游非常高興，“曰‘除乎！司寇將見我’”。為魯司寇前來拜訪佈置“大掃除”。“門人既除，而司寇不至”，言游感到魯司寇心不誠，不是真正地重用自己，因而決計離去。魯司寇前來挽留，問子游是如何想的，“將焉往”，準備到哪兒去。子游告訴魯司寇“食而弗與為禮，是獸工畜之也。”我是賢人，你不予以賢人應有的禮遇，把我當成普通的工匠對待。“偃也修其德行，以受獸工之食於子，於偃違，於子損，於是乎何待？”我追求的是道德修養，在你那裏卻享受“獸工”一樣的待遇。這樣，對於我來說有違背初衷的遺憾，對於你來說也有錢財方面的損耗，既然如此，我接受你的委任，替你做點事還有什麼意義？“遂行”，於是，離開了魯國。“至宋、衛之間，其一子道餓而死焉。”門人勸他“吾子齒年長矣，家生甚急，生未有所定，願吾子之圖之也。”先生您年紀大了，生計緊張，尚未安定，應該考慮這些困難，重回魯國。子游是接受還是否定了這一意見，簡文有缺，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記載寫的全是子游之事，與孔子無關。因此，其篇名不當稱為《子道餓》，可稱為《言游》或《子游》。鄧少平稱之為《魯司寇奇言

游》如果“奇”讀為“寄”，即《魯司寇寄言游》。如果將首句全文作為篇名，則當稱之為《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

第三，從子游的事跡看，簡文所載絕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①而“孔子厄於陳蔡”是魯哀公六年（前 489），孔子六十三歲，依此，子游年方十八。如果簡文是指“孔子厄於陳蔡”之時，子游年方十八就有“門人”從遊，這是不可能的。《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云“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②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八一《承師一》亦云“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③即便如此，子游此時亦年僅二十八歲，與簡文中其門人稱其“齒年長矣”顯然不合。由此可見，竹書所載子游事，絕非發生在魯哀公六年“孔子厄於陳蔡”之時。

孔子生前，子游應該不會率其門人“食於”人。所以，簡文所載子游事，應當發生在孔子死後。據《左傳》記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④是為公元前 479 年，“孔子年七十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⑤子游在魯哀公十九年（前 476）時，應該還在“魯城北泗上”為孔子服喪。

子游卒於何時，史無明證。錢穆考證“《檀弓》載‘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是有子卒在悼公世，先子游。據《言氏舊

① 《史記》卷六七，頁 2201。

② 《孔子家語》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95 冊，頁 86 上。另同文書局（1923 年）石印影宋抄本亦有“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二句。四部叢刊等影印明覆宋刊本則無此二句。

③ 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頁 5075。

④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〇，十三經注疏本，頁 2177 中。

⑤ 《史記》卷四七，頁 1945。

譜》子游卒年六十四,若其說可信,則為魯悼公之二十五年,而有若猶在前。”^①案:魯悼公在位三十八年,即公元前466年至前429年。魯悼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442年。這是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說推算的。若以《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孔子三十五歲”為據,子游則當卒於魯悼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452年。當然這是建立在《言氏舊譜》子游卒年六十四說基礎上的。如果《言氏舊譜》說不可信,不論公元前442年,還是公元前452年,哪一說都沒有意義。但不管怎麼說,《禮記·檀弓》告訴我們:魯悼公時,有若出喪,子游還在魯國相助老友之喪禮。而簡文記載的子游事迹,應當就發生在魯哀公十九年(前476)至魯悼公年間。

關於孔子弟子的生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記載往往不如《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錢穆指出:

必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列傳》。或說少三十歲《索隱》引《家語》。

崔述云“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金鶚亦辨之。據此,則《家語》之年為當也。^②這是其一。

樊須,少孔子三十六歲《列傳》。

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魯及齊師戰於郊,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其時樊遲年三十二,不可謂弱。文十二年《傳》,有寵而弱。十四年《傳》,

^①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5年,頁78。

^② 同上書,頁76。

穀之子弱。成二年《傳》二君弱，皆謂年少。疑當少孔子四十六歲，時年二十二也。今《家語》正作少四十六。費氏《門人考》依之。^①這是其二。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列傳》。或說少三十三歲《正義》引《家語》。又《論語》邢疏引《史記》作少四十三歲。

崔述云“吳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時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金鶚亦有辨。據此則《家語》之年為當。微虎之事在魯哀公八年，有子蓋年二十四。^②

這是其三。

錢先生的上述分析都是正確的。不過，關於子游的生年，卻有問題。錢先生說：

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列傳》。

按：孔子反魯，子游年二十三。蓋其從遊當在孔子反魯後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僅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此閻氏誤讀《論語》從我於陳、蔡以下兩章為一章，故云爾。又《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禮運注》亦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考孔子年五十一為司寇，子游年六歲，孔子五十五歲去魯，子游年十歲，孔子與語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後人猶有信《禮運》大同為真孔子當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論世考年之咎。^③

①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78。

② 同上書，頁78。

③ 同上書，頁71—72。

案：子游的生年，錢穆是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說，故以為《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言偃在側”說不可信，因為“孔子年五十一為司寇，子游年六歲”，“孔子與語大同小康”，決無可能。同理，錢穆也不相信“孔子厄於陳、蔡”時，子游在側，因為“時子游年僅十八”。所以他認為“其從遊當在孔子反魯後也”。這一認識，雖然很有代表性，卻未必正確。如果從《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言偃”“少孔子三十五歲”說，孔子為司寇時，子游已十六歲矣，“孔子與語大同小康”就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了。^① 所以，從《禮記·禮運》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關於子游生年的記載，顯然比《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要合理。錢先生為什麼在宓子賤、樊遲、有若的生年上取《家語》說，而在子游的生年上卻取《史記》說？其間的重要原因應該是錢先生所用的《家語》是時下流行的四部叢刊一類的本子，此等刊本並無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句，而同文書局石印影宋抄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錢先生或棄而未用了。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子游早在公元前499年（魯定公十一年）孔子為魯司寇時，就已追隨孔子。孔子周遊列國時，他也隨侍在旁，決非“其從遊當在孔子反魯後也”。魯悼公（前466—前429年在位）時，有若出喪，子游還在魯國相助過老友之喪禮。而簡文所謂“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子游辭行“至宋、衛之間”遇險的事跡，當是子游為孔子“廬墓三年”以後之事。這是傳世文獻從來沒有過的新記載。

① 李銳6月初讀到拙文初稿後告我，楊朝明、盧梅《子游生年與〈禮運〉的可信性問題》（《河北學刊》2010年第7期）已有此說。案：這一觀點我雖尚未成文，但我從2001年指導張岩作《孔子家語》研究時就在校內、校外很多場合講述過。而我與鄒新明點校的《孔子家語》（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正是以同文書局影印宋抄本為底本，取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說。

三 子游之學的重估

孔子後學，自宋以來，以顏、曾、思、孟最爲出名。但《荀子·非十二子》卻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①以“子游”與“仲尼”並稱，人多不解。郭嵩燾、日人久保愛都以爲“子游”係“子弓”之誤。高亨疑“游”本作“泓”，形似而誤。“子泓”即“子弓”。^②王天海說同。^③但劉師培卻認爲“‘子游’二字非訛。孟子之學說，未嘗不出於子游。蓋尊孔子爲荀、孟所同，一尊子弓，一法子游，則所趨各異。若此文作‘子弓’，則子思、孟子之書固無一語及子弓也。”^④郭沫若也說“既言思、孟之學乃‘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這便是他們出於子游氏之儒的證據了”，“本處之所以獨言‘仲尼、子游’者，乃指子思、孟軻的道統”。^⑤康有爲更說“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⑥這些本於《荀子·非十二子》，以思、孟“出於子游”的說法，較之宋儒說，應該更爲可靠。

郭店楚墓所出諸篇儒簡，人多目爲思孟學派之作。其中《五行》篇可能爲子思自作，《魯穆公問子思》記載子思事迹，當成於子

①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94—95。

② 高亨《荀子新箋》氏著《諸子新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1年，頁141。

③ 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12。

④ 劉師培《荀子補釋》，《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949。

⑤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32。

⑥ 康有爲《孟子微·自序一》，氏著《孟子微 禮運注 中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

思弟子之手《六德》篇“匿之爲言也”一段與《五行》篇相近,可知其與子思之學頗有關係《緇衣》一篇與子思也有一定的聯繫。這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謂的《性自命出》篇,則分歧較大。有人看到簡文論樂,就以爲是公孫尼子之作,^①還有人認爲是子思或子思門人之作。^②都不可靠。但簡文“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舞”一段話亦見於《禮記·檀弓下》,^③明言出於子游之口,是子游答有子之言。以此看,簡文屬於子游之作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而真正屬於顏淵、曾參的言論,在郭店簡中並不明顯。所以,筆者就曾提出:“從簡文主流看,當出於子游、子思學派。”^④這與《荀子·非十二子》將子思、孟子之學由子游上溯孔子其實是一致的,可以說是恰恰印證了《荀子·非十二子》之說。

《荀子·非十二子》又謂“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⑤劉師培指出“《孟子·滕文公》篇答彭庚之問正與《荀子》所譏者合。”^⑥這是認爲《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答彭更“士無事而食”之問正是源於“子游氏之賤儒”的“君子固不用力”說。其實,《滕文公上》孟子答陳相問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⑦說與“君子

① 陳來《荆門竹簡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兼談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中國哲學》第20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84;郭沂《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5。

③ 《禮記正義》卷九“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十三經注疏本,頁1304中。

④ 廖名春《郭店楚簡儒學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⑤ 《荀子集解》卷三,頁105。

⑥ 劉師培《荀子補釋》,頁949。

⑦ 《孟子注疏》卷五下,十三經注疏本,頁2705下。

固不用力”更似。

不過 郝懿行的解釋更值得我們注意 “此三儒者 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 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 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 非賤三子也。”^①如此說來, “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耆飲食” 老是說“君子固不用力”的 是出於子游門下的“賤儒”, 也就是說 是其門人中有之 而非子游本人。郝氏此說在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篇中可以得到證明。

從簡文看 孔子死後, “魯司寇寄言游於遠楚” 只是因爲魯司寇“弗與爲禮”, 子游視同於以“獸工畜之” 爲了“修其德行” 他毅然決然地辭行。 “至宋、衛之間”, 竟然有“一子道餓而死”。從這些記載看 子游決非“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耆飲食”之徒 他的“德行”是高潔的。

子游“門人”在此生死考驗面前 有“吾子齒年長矣 家生甚急 生未有所定 願吾子之圖之也”之“諫”, 這倒是有些“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耆飲食”的味道 說是其門下的“賤儒”, 亦不爲過。只是子游在世時 這只是一種苗頭。想必子游死後, “門人”這一“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耆飲食”的跡象就更加明顯了 以致就有了《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子游氏之賤儒”的批評。

在孔門“四科”中 子游與子夏列爲“文學”, 即“善先王典文”,^②即熟悉古代文獻。子夏爲“文學”第二 人多肯定其傳經之功。如東漢徐防說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③朱彝尊更說:

① 轉引自《荀子集解》卷三 頁 105。

② 《論語集釋》卷二二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 年 頁 774。

③ 《後漢書》卷四四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年 頁 1500。

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具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①

子游之成就則主要在“習禮”上。《尸子》有所謂“禮不習，子游侍”說。^②沈德潛《吳公祠記》指出：

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輕重，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舞”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③

但比起子夏來，其影響畢竟有所不及，為何又能號為“文學”第一，其原因值得深究。

筆者認為子游之所以能被孔子列為“文學”第一，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子游傳經重在得其精要，得其精義。《禮記·禮運》記載“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僂在側曰“君子何嘆？”^④結果引出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論來。孔子這一最為著名的思想，應該是子游一系傳承下來的。子夏的傳經，與此相比，無疑有“形下”、“形上”之別。《論語·子張》記載“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① 朱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曝書亭集》卷六五，四部叢刊縮印本，359冊，頁495下。

② 《釋史》卷九五之一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67冊，頁142上。

③ 《歸愚文鈔》卷八，《清代詩文集彙編》(234)《沈歸愚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0年，頁489下-490上。

④ 《禮記正義》卷二一，頁1413下。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①重末輕本，這是對“子夏之門人小子”的批評，也是對子夏本人的評價。

二是子游的傳經，不限於知識的傳授，更重視經學精神的實踐。《論語·陽貨》又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②

子游宰武城，推行教化，連孔子都有點以為他是小題大做，他卻以此折服了孔子。可見他踐行的認真。“行重於言”，“行勝於言”，傳經也是如此。這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最基本的性格。所以，儘管人們有“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的說法^③，但子游在孔門中的地位，實質上要遠勝於子夏、子張之輩。上承孔子，下啓思、孟的，不是顏、曾，而應該是子游，這是我們讀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魯楚》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所獲得的新啓發。

(本文作者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① 《論語注疏》卷一九，十三經注疏本，頁 2532 上。

② 同上書卷一七，頁 2524 下。

③ 《孟子注疏》卷三上《公孫丑上》，頁 2686 上。

Abstracts

The Shanfu Shan Ding-tripod and the Reign Period of King Li

Li Xueqin(p. 1)

According to the Zhongcheng Fu Ding-tripod excavated from Nanyang , we can know King Yi of Zhou dynasty had an elder son called Jian Bo. Shan , the grandson of Jian Bo , made the Shanfu Shan Ding-tripod , which recorded that in the thirty seventh year Shan was charged to serve the liquor-drinking for the King. Considering the age of Jian Bo , the event could have happened only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Li. Thus the reign period of King Li recorded in “Zhou Benji” of *Shiji* 《史記·周本紀》 can be verified.

An Investigative Study of the “Sikou of Lu Entrusted Qun Chu to Yan You”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Manuscripts

Liao Ming Chun(p. 9)

The chapter of “Zi Dao Er”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Manuscripts , not associated with Confucius , but recording the deed of Ziyou , should be titled as “Sikou 司寇 of Lu entrusted Qun Chu to Yan You”. As is recorded in the Bamboo Manuscripts , it might be after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for Confucius that Yan You was caught in a dilemma when he came to the area between Song and Wei after Sikou of Lu entrusted Qun Chu to him. This new text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on of Ziyou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disciples of Confucius. It is Ziyou , not Ziyuan or Ziyu , that inherite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initiated the school of Zisizi and Mencius.